

上海高学历新移民的居住选择与职业机会

陆巍戌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论文将大都市中年轻的高学历移民放入到“全球城市”的大背景之中, 通过对“教育”、“人才”、“户籍”等制度与年轻人的向上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购房”对于高学历移民的地位身份实现所具有的意味, 以及作为“人才”的新移民在城市政府的“住房吸纳—住房排斥”制度框架中所处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 高学历新移民; 大都市性; 居住选择; 职业机会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1 导论

改革开放之后, 户籍已经不再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屏障, 大量移民涌入城市以寻求更多的职业机会。这些移民群体中的大部分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在过去几年的研究里, 各学科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 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兴起的对“三农”问题的广泛关注密不可分。然而, 对当代中国都市问题的考察, 都市中后工业产业的发展势头也逐渐成为不能被忽略的问题。在诸如上海这样的中国主要大都市中, 产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长, 其中包括了数量庞大的白领职业群体。近年来, 来沪高学历移民的人数虽然在流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但因流动人口总数成倍的增长, 这部分高学历移民群体其实也已构成了绝对数量庞大的都市人群^[1]。都市高学历移民人口的增长, 当然与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密不可分。从 1999 年到 2007 年的 8 年间, 中国高校受到扩招政策影响, 招生数量从 108 万人迅速增长到 566 万人, 相应的, 从 2002 年到 2007 年, 高校毕业生的数量也从 134 万人增长到 448 万人(表 1)。最初的扩招, 是打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的口号推行的。这样一种增长并非源自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口号中所称的“就业压力”指的是 90 年代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的下岗等问题而造成劳动力市场紧张^[2]。然而, 虽然当年的大学扩招政策缓解了部分社会就业压力, 但在若干年后, 扩招打开的口子已经无法收拢, 大学毕业生数量呈倍数增长, 新的就业问题也随之产生。高校毕业生非但不再是往日的“天之骄子”, 反而其中的部分人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这一背景下, 本研究中, 作者选择将视角从一度的学术热点——都市“农民工”群体转向都市中的高学历移民群体。

收稿日期: 2011-12-3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 2009BSH002)

作者简介: 陆巍戌,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生

[1] 卢汉龙:《上海精英的城之恋》,《检察风云》2010 年 01 期。

[2] 冯建军, 李为忠:《教育发展的根本之道在于尊重教育规律——对十年扩招之路的反思》,《探索与争鸣》, 2009 年 02 期

表 1 全国高校每年招收和毕业人数统计

年份	招收新生数	毕业生数
1998	1,084,000	830,000
1999	1,597,000 ^a	848,000
2000	2,206,000	950,000
2001	2,683,000	1,036,000
2002	3,205,000	1,337,000
2003	3,822,000	1,877,000 ^b
2004	4,473,000	2,391,000
2005	5,045,000	3,068,000
2006	5,461,000	3,775,000
2007	5,659,000	4,478,000

a. 第一年扩招影响下的招生数

b. 毕业生数量受扩招影响的第一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8 年)

在着手对高学历移民群体进行研究的同一时期，《蚁族》^[3]和《蜗居》等调研报告和艺术作品高调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白领蜗居大都市”、“大学毕业生成为大都市新贫困群体”等话题进入了公众视野；而另一方面，当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热门的公共议题之后，类似“白领撤离大城市”、“大学毕业生选择中小城市”却也开始频频见诸于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之中。事实上，“白领”和大学毕业生“蜗居”和“撤离”大都市这两个命题隐藏着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如果这些群体真的可以有离开大都市的选择，那么在城市中的“蜗居”何以会成为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对所谓“蜗居”和“蚁族”群体的困境现状的研究分析，往往直指都市居住制度和房产市场的种种弊端，却忽略了对这些高学历新移民个体与都市开发之间关系的分析。这些新移民如何进入大都市（在本研究中为上海）；在生活与职业层面上如何与所处的大都市发生关系；何以在高房价、高租金的压力下，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大都市中，而另一部分人能选择主动撤出？

1.1 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所指“在沪高学历新移民”，是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来自外地、且在上海长期工作居住的新移民群体（其中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并不作为划分的依据）。其中，本研究中对“长期工作居住”概念并不作很严格的限定。这样一种对“新移民”的概念界定，与陈映芳在《移民上海》前言中所说的“对既存事实的认定”的界定非常相似，以在上海长期居住的意向和事实，而非法律身份作为界定依据^[4]。重点要考察的，是这些新移民的流动过程（包括社会流动及空间流动），而不是他们成为法律意义上“新上海人”的过程。

另外需要解释的是：本文中反复使用“高学历新移民”这样一个短语来描述我的研究对

[3]廉思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陈映芳编：《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象。初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拗口的短语。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我曾考虑使用“白领移民”一词指代研究对象。然而,在定稿中最终没有采用“白领移民”这一看上去似乎更为简洁的概念,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白领”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和媒体都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很多研究者和媒体报道不加区别地将“白领”与“中产阶级”混用,造成这一概念界定的模糊与混淆。2)“白领”一词更多表示的是一种由职业所带来的属性,而本文中的“高学历新移民”概念并不侧重于新移民的职业身份。3)最后,将学历作为划分这一群体的主要变量,更重要的考虑是在下文中反复强调的“‘人才’与都市”的研究主题。

1.2 研究框架

该如何去回答上文所提出的问题?笔者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

第一、从职业和居住生活两个维度同时考察新移民的大都市体验。也即是如卡斯特所说,考察在这些新移民身上“作为人的人(People as people)”和“作为工作者/消费者的人(People as worker/consumer)”两种角色的分离^[5]。具体指:高学历/高等教育所赋予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当代大都市“人才资源开发”的暗合(作为工作者的人);新移民与大都市土地房产开发的互动(作为消费者的人);以及他们作为在都市中生活、生存的个体,所体验的大都市日常生活(作为人的人)。

第二、将“大都市性”(metropolitanism)的概念纳入研究的框架中。“蜗居”和“蚁族”概念的热炒,均是围绕个别大都市中居住问题而展开的。过去对于“农民工”、“流动人口”等的研究,着眼于对“乡—城”二元结构之间流动的分析。然而,自从改革开放打破毛时代抑制城市发展的政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Doulet,2008),当“城市”开始逐渐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甚至城市/城镇人口已经逐渐要超越农村人口之际(戴维斯,2009),在“乡—城”结构之外,“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构成一个新的问题。在众多对大城市进行研究的理论模型中——不论是弗里德曼(Friedmann)所说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撒森(Sassen)所称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还是卡斯特所指的“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 City)——都将个别大都市和其他次级的城市区别开来,将个别大都市作为单独的研究平台。这些个别大城市正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而形成一种新的都市空间^[6]。当这些个别大都市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体系之中,成为重要生产节点的时候,它们对各类资源的吸纳、白领职业的比例、以及居住条件都与其他城市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在笔者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将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进行考察。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城市”背景下,高学历新移民本身所特有的属性——学历、技术才与其生存的都市的工作环境互相呼应。

2 城市对“人才”的吸纳

“人才”,是当代中国社会非常值得寻味的词。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有才能的人”这一字面的意思。笔者认为,“人才”是一个充满发展主义色彩的制度性词汇。而围绕着当

[5]【法】曼纽尔·卡斯特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千年终结》,夏铸九 黄慧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6] 孙哲:《都市邻里的形成——从“业主”到“市民”》,载于陈映芳等著:《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436页。

代中国大都市高学历新移民的许多问题，都或多或少与城市开发如何利用“人才”资源有所关联。高等教育赋予个体的，不仅仅是知识技术或是一份学历文凭，同时也赋予了个体“人才”的制度性身份。

2.1 成为“人才”：高等教育与个体社会流动

在公开招生、以标准化考试为评判标准的体系背景之下，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实现个体上升流动（社会底层群体）、或者维持阶层地位（中上阶层）的有效途径。这样一种社会流动，既包括了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职业阶层的流动，也包含了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脱离家庭经济阶层的向上流动，同时也是一种个体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流动。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高等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个体“把握自我命运”的流动手段，（周作宇，2001；Haveman & Smeeding, 2006；Sewell & Shah, 1967；贝克，2003）。对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期待，还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以后工作分配制度的打破。一位年龄较大的被访者如此描述在他参加中考那年他们老家的情形：

“当时大家愿意考中专，93年的时候很多成绩也不错的，但选择读中专去了，包分配呀。中专那时候吸引力还是很大的。你想想，那个时候经济状况，读完中专之后立马就可以分配下来，不错的。93年一定要读高中的观念还在我们那还比较少的。中专还是很热门的。但是过了两三年就不行了，观念就改变了。92年、91年那时候毕业的中专生还是比较好的，也混的不错。”（个案5）

改革之后，计划经济下的职业系统逐渐放开、市场化，个体被抛出了单位系统、抛向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农民和蓝领阶层无法再依赖于计划体制获得职业机会，也无法被固定于某个“铁饭碗”职位之上；另一方面，城市中具有高等学历的群体却欣喜地迎来了职业的市场化，脱离僵化的单位体制的束缚，自由选择进入其他更有活力的经济部门^[7]。这样的反差，使得高等教育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上升流动途径。

至今为止，高考几乎仍然是获取高等教育资质的唯一途径，而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来自于高考。这便使得基础教育阶段，考取大学成为了几乎唯一的目标。这当然早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笔者也没有必要在此赘述这一问题。但在访谈中，一些被访者所讲述的高考体验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新移民的高等教育学历对他们而言的意义。

“如果你不是想考大学的话，没有必要考高中，直接初中一毕业在家。现在反而是父母出来打工后，认识到外面这个环境不好，不希望自己孩子早点出来。哪怕是上一个很差很差的高中，明知道在学校里上可能上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愿意让他出来。所以家里小孩如果要读高中，一定要读最好的。现在多元化了，有一部分人希望自己是精英，然后读最好的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大致没有方向嘛，先读高中再说，考进一般大学也行。（个案4）

对于来自农村的新移民而言，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还意味着脱离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束缚。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诚然，农村的青年可以通过进城务工的方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通过高等教育的方式成为都市白领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从小的话，我认识就是，我如果读书不好，我的出路很清楚，两个出路：

[7] Lisa M. Hoffman, *Post-Mao Professionalism,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68-181.

回家种地，这我太清楚怎么回事了，春天要耕，夏天要管理，冬天收也很辛苦，还要看天吃饭。我们一直都看天吃饭，每天说什么农业现代化都是瞎扯的。很辛苦，这个苦我不愿意吃的。出去打工，打工的话，因为徐州是江苏省第三大城市。我就很清楚一个农村人来到城市里，没有文化你怎样生活，很清楚。一个考大学到这边工作的状况，也很清楚，所以我对外打工也不抱什么希望的。这两条路我都是不想要的，那我还有第三条路就是考大学。”（个案 15）

“最起码，如果是在以前的话，至少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再早的时候可以说是跳龙门嘛。现在又有很多变化，不像以前那么的，怎么说，感觉像脱胎换骨一样。现在打工的话，如果你没有高中文凭，你连打工的机会都很少。很多家长都会说，不管读书有没有用，先把这个读书读出来，该学的先学到手，总归比呆在家里十几岁二十岁就在外面打工要好。”（个案 11）

2.2 “人才”：一种制度性的身份

虽然说“人才”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一条政策制度给“人才”下过一个常规的定义。只有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条例中才会对“人才”进行一些非常细化具体的界定。总体而言，“人才”在政府的话语中指的是具有专业技术的个体。“人才”并不等同于中性的“人力资源”或者“人力资本”概念，而是一个带有强烈发展主义色彩的词汇。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人才”是伴随着 1970 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变迁而被政府广泛运用的概念（Yang, Zhang & Zhang 2004），其语境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这一推断可以在各类政府文件中得以印证。例如，我们可以在 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看到如下表述：

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略]……小康大业，人才为本。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关键在人才。必须把人才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大力开发人才资源，走人才强国之路。

而在 1999 年上海市人事局颁布的《上海市吸引国内优秀人才来沪工作实施办法》中的第一条也明确表示制定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吸引国内优秀人才来沪工作，促进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快构筑上海人才资源高地”。并且，在此《办法》中还明确对“人才”进行了界定：

- 1、本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员；
- 2、本市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
- 3、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 4、本市紧缺、急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 5、具有特殊才能的各类人员。

可以发现，政府条文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才”引进与都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同时还对“人才”的学历水平设置了硬性的标准。这些政府政策条文直接影响了日后颁布的包括居住证制度在内的各类“人才”引进制度和策略。而笔者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将研究对象

表 2 上海历年引进人才发放本市户籍及居住证数量

年份	居住证发放数量	户口发放数量
2004	39,685	11,228
2005	62,678	4,657
2006	76,631	2,640
2007	131,517	2,563
2008	149,694	5,245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2009）

定义为“高学历”移民群体，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类似的政府政策条文还有很多，但仅通过以上两案例既可看出“人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强烈发展主义色彩的概念。在这样的语境里，具有专业才能的个体被视作是国家或地方发展所需的可投资和开发的人力资源。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不论是职业教育还是学历教育），在个人层面上是个人素质和求职能力的提升，在都市开发的层面上外部的“人才”、有待吸纳的人力资源。高学历移民，不论是在上海高校就读后留沪还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来沪就业，在政府视野下，都首先被纳入了“人才”的框架里，成为了服务于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人才”身份的制度性优势

相较于农民工这类移民群体而言，高学历移民的“人才”身份给他们在都市中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都市政府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其中，都市政府手中所掌控的各种福利资源以及户籍资源成为了最有力的“人才”吸引手段。自 2002 年起，上海政府就开始使用评分系统，综合考评个人的专业技能、成就、以及对上海发展的贡献，以审核外来人口取得户籍的资格^[8]。除上海城市户口的授予之外，自 2004 年起，上海政府又颁布了居住证的新政。居住证分为人才引进类（AB 类）和临时居住证（C 类）两大类，其中人才引进类居住证又分境内人才（A 类）和境外人才（B 类）居住证。居住证不同于户籍，对于居住证持有者来说，居住证赋予他们的是有限的市民待遇，包括有限的社会保障，子女在本地入学及考试的机会。

上海户口和居住证资源的可获取性以及易获取性，使得在上海的高学历移民与民工等移民群体最大的区别之一。借助户口和居住证的发放，都市政府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吸引“人才”长期居留上海的筛选机制，同时又将其他移民群体阻挡在市民待遇之外。居住证的颁发从一开始，就是以政策条文的形式明确表达了其被用以筛选吸引“人才”资源的目的^[9]。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表 2），2008 年上海共发放了 149694 本居住证，其中，60382 本居住证为新发证，其余为续签居住证。然而，同时可以看到，随着居住证制度的正式启用（居住证在 2002 年启用，但在 2004 年才正式作为人才吸引制度全面启动），上海市政府也收紧了户籍发放的口子，上海以引进人才为目的的户籍发放数量从 2004 年的

[8] 《新闻背景：上海户籍改革历程》，

http://www.sh.xinhuanet.com/zhuantit2009/2009-02/23/content_15769922.htm

[9] 《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中第一条就指出：“为了促进人才流动，鼓励国内外人才来本市工作或者创业，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制定本规定。”

11228 人直接锐减到 2005 年的 4657 人, 2006-2007 年间引进人才户籍年均数量更是低于了 3000 人。从短期来看, 居住证能给“人才”提供在上海居住生活的各项市民待遇, 甚至还包括了子女就读的机会, 但实际上, 居住证本身和国际移民绿卡非常类似, 只赋予了持证者有限的市民待遇。甚至, 对于居住证的持有者来说, 虽然可以缴纳“四金”, 但却因居住证与工作挂钩,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几乎是享受不到的, 医疗保险也只能部分享受, 实际上持证者只能享受全额住房公积金待遇, 而住房公积金也只能用来购买上海本地的房产。通过居住证制度的建立, 上海政府成功地通过分享部分市民待遇来吸引外来“人才”资源, 而成功控制了“户籍”这一资源的分配。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研究进行期间(2009 年), 上海政府的户籍政策正处于新一轮调整之中, 在 2009 年政府就颁布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户改政策。对于这些政策的走向和具体执行, 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察。

陈映芳在《开发制度与城市准入制——住房吸纳和住房排斥》^[10]一文中提出:《蓝印户口》到《居住证》的政策性调整主要是以城市利益最大化目标为其基本宗旨的。“为了促进人才流动, 鼓励国内外人才来本市工作或创业,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政府将“人才”与城市竞争力相挂钩, 并将“城市利益优先的城市立场加以正当化”; 但是持《居住证》的外来人员所缴纳的公积金并不能用以购房抵押贷款、购买外地住宅, 甚至是在上海的租房费用。从而, 伴随着都市大开发被“邀请”进入的“人才”大军在实际的每日居住层面上却处于实实在在的尴尬境地, 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大举上涨的形势之下, 为此他们不得不用各自的住房选择来应对私人领域中所遭遇的“住房排斥”^[11]。

然而, 获得户籍和居住证的可能性, 真的能刺激高学历群体移居大都市么? 相反, 不论从政策层面还是实证研究层面分析, 居住证对于高学历移民而言, 仍然是一种筛选机制而未必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刚毕业不久的社会新人而言, 能否在上海久居都是一个未知数, 长期的上海户籍身份努力去争取一下尚有意义, 但居住证这样的非完全市民身份对新移民的意义也许并不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重要。访谈研究中, 一些被访者也如此表达了他们对居住证的想法:

(居住证对你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没有啊, 我不知道别人哦, 反正我觉得居住证对我就是能交住房公积金, 因为住房公积金一部分我交, 一部分公司交。以后我买房可以用, 如果不买, 我可以带走。其他的, 我们公司就是那种镇保, 即使交的是城保, 很多都是统筹的那部分, 养老的什么的, 不管以后有没有用, 起码现在看来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也没深究过这种东西。” (个案 3)

“其实对我来说, 当时考虑能不能交金, 居住证可以交金嘛, 那就没有其他影响了。顶多就是我去办个护照啊, 港澳通行证啊我要回家去办。这个会比较麻烦, 其他的还没什么影响。可能对于以后的话, 结婚了, 子女啊上学什么的比较有影响。但就现在这种情况来说, 因为政策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也没办法考虑那么远。”(个案 16)

“其实我一直都不想办的, 因为我之前公司和现在公司交公积金都不需要居住证, 都帮你交的。对我们来说, 现在办居住证唯一的好处, 就是可以交公积金嘛。”

[10]陈映芳等(2009), 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第十章

[11]陈映芳:《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 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原文刊于《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53-680 页。

后来觉得可能会长久待(上海),以后也许政策会变,里面交的钱也许我走了的话,到别的地方去啊,也许政策变了以后都可以异地转了嘛。现在用不到,不代表以后用不到,所以这个东西办了再说。”(个案11)

“居住证其实我也没太多想法,其实主要是长远的想法的问题了。其实在上海呆,现在差不多定下来肯定就是在上海了——但现在办居住证很麻烦,每年还要续办。现在其实不办居住证也可以给你交住房公积金。像养老啊,医疗这些啊无所谓的,一年基本都不去医院的。而且这些都给国家交钱的。”(个案14)

从政策上而言,户籍和居住证的发放数量有限,并且有众多附带条件的限制;而对部分新移民个体而言,只要能“交金”,更重要的是住房公积金,有没有居住证并没有太大差别。另外,对于青年移民而言,是否会继续留在上海都不是一个定数,甚至有了户口反而成为一个负担。因此,笔者认为,真正左右高学历新移民在大都市中长期居住或是短暂停留的,未必是居住证和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准入门槛,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3 新移民的居住选择

住房,是都市中最为特殊的消费品。托巴洛夫(Topalov)认为:住房作为消费品之所以特殊,是因住房所依附的土地的无法再生、住房和居民收入不成比例、以及房产相对较不自由的市场流动的特点所致^[12]。居住的选择是任何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都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蚁族”和“蜗居”之所以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从最直接的原因上说,是当前中国大都市中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不成正比的结果。在这一章节中,将分析高学历新移民居住选择的策略。可以看到,在居住选择的问题上,高学历新移民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本地居民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所折射出的高学历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属性,将进一步引导我们对当前大都市高学历新移民生存困境的理解。

本章节将分别分析新移民群体“租房”和“购房”两大类居住选择策略。这两种居住选择,对于高学历移民来说,并不是并行的关系,从“租房”到“购房”的跨越,是任何一个移民在都市空间中从流动转向固定的重要一步。因此,访谈中涉及居住问题的部分,重点考察的是新移民如何选择租房(行动)、以及如何考虑在上海的购房问题(意识)。

3.1 租房:不稳定的居住策略

吴维平认为,中国都市中本地市民(本市户籍拥有者)获取住房的方式有三种:公共配给的住房、商品房、以及经济适用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而没有户口的移民则被排斥在公共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之外,而租借则是移民的主要住房选择(Wu, 2002; 陈映芳, 2009)。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指出,对于农民工来说,雇佣单位提供的宿舍、当地政府提供的员工楼也是常见的住房选择手段,对从事工业生产的移民尤其明显,尤其在都市近郊的工业开发区,不论是工厂提供宿舍,还是当地政府提供的农民工公寓和员工楼都是常见的居住解决方案^[13]。另

[12] 托巴洛夫在《住房——一种奇怪的商品》(巴黎, 哈麦丹出版社, 1992)的前言所提, 引自【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著:《城市社会学》, 徐伟民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5-47页

[13] Min Zhou & Guoxuan Cai: Trapped in Neglected Corners of a Booming Metropolis: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zhou, John R. Logan.ed.(2008),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PP226-246.

外,结合我们过往在上海周边工业区的调研,我们也发现,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者,住宿的解决方案反而更为灵活。不论是在市区从事餐饮、家政等消费服务行业,还是在近郊工厂从事工业生产,“包吃包住”是招工过程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待遇条件。另外,在近郊的工业区工作的外来务工者,还可以通过租借当地农民的私房来解决住宿问题。

如果仅仅将“中国都市移民”粗略地理解为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主的迁移人口的话,那么这些移民的居住选择,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类:

- 1.宿舍、员工楼等公共住房(工业区移民、大型工厂、以及部分服务行业)
- 2.租用农民私房(近郊工业区)
- 3.租用市区商品房和老公房(包括群租)
- 4.购买商品住房

而高学历新移民在都市中的住房选择,则以以下几种情况为主:

- 1.租用商品房和老公房(以合租为主,也包括部分群租)
- 2.宿舍楼、员工楼(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及部分近郊工业区)
- 3.购买商品住房

相对于农民工而言,高学历新移民的居住更多依靠的是较为个体化的解决方案。宿舍楼、员工楼的居住形式并不是白领移民的主要居住模式。高学历新移民,由于高等教育带给他们的技术和文凭优势,部分从事工作地在市区的白领职业,部分技术类工作的高学历新移民则扎堆近郊的各大新兴工业园区。即使为了节省房租的开销,由于通勤的问题,很多人也未必愿意选择近郊的廉价住房。上海因循轨道交通而进行的都市开发,也使得房产开发中“市区”的边界变得相对模糊。与“农民工”等移民不同的是,宿舍、员工楼、郊区私房并不是高学历移民住房的主要选择。又因为公共性租赁房的缺失,租借商品房和老公房成为租房者的主要选择。这是上海都市开发的空间形式与高学历移民的职业选择特征所共同造成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公共租赁房的缺失,上海的高学历移民在市区或近郊租借的,一般是个人出于投资目的购置或闲置而出租的住房,房东随时可以解散租赁,此类出租房租赁的稳定性较差。

白领新移民租房选择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房租的要求(越便宜越好,甚至与收入不成正比),不介意居住环境的低标准。对低房租的要求并非完全受收入限制,更多是在考虑到“买房”因素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对于新移民来说,高房价带来的不仅仅是买房的压力,也强化了在租房过程中对于租金的要求。

第二、居住选择受工作地点影响大,换工作往往导致换住所。即使与异性伴侣一同居住,一方的工作便利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一方面是租房所带来的便利性,但同时也反映了居住选择受到职业选择的影响。“居住”是依附于“工作”的次要因素。

第三、倾向与同学、同事合租以获得居住的安全感(这一点与农民工对同乡的依赖形成强烈对比)高等教育并非仅仅是一个传授技术的过程,同时彻底重构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使身在异乡,这些高学历新移民也并不像农民工那样依赖老乡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同乡在高学历移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处于一个非常边缘化的位置。甚至,即使与多名同学合租一套房,居住环境拥挤不堪,他们反将其视作大学生活的“热闹”的延续。

3.1.1 群租: 压抑的居住环境

群租,在制度规定中,是指将原规划设计中的单间分割出租给不同个体,并且人均承租

面积小于 5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形式。^[14]群租房的房东（或者二房东）往往以宿舍形式将大户型商品房的单间分割给好几个租客，甚至有时候将近 10 人通过上下铺的形式居住在同一房间内。群租房即在近郊监管不严的区域存在，在交通便捷的市区的商品房中也大量存在。群租行为本身不被法律所允许，但正如街头摊贩与城管之间的猫鼠游戏一样，实际上群租行为仍然悄悄地散布在这个城市^[15]。选择群租房最大的好处是租金十分低廉，且可通过支付非常低的租金居住在交通和各项设施相对便利的市区住宅区内。但群租房恶劣的居住环境使得群租只可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居住选择。一位居住在群租房里的被访者在提到她第一天见到她现在租住的房间时的情景：

“这边已经是我看的最好的房子了，但是要我住进来的话，我当时还是觉得‘哎，天啊，’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自己家里的床，自己家里的房间。当时我就在这边站了很久很久，我知道我会住下来，我会选定这里的。房东说要先付押金，如果不付的话不能保证你明天搬来的时候这个床位还在。那我就站了很久，就是说有点要下决心怎样的。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里是没有什么私人空间的。”（个案 1）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租住形式，群租所带来的是一种不稳定、与期望高度不符的居住体验，虽然群租房的租金是任何一个新移民都可以承受的起的。群租的环境下，无法选择自己的租住伙伴，同室的室友流动性也较大，安全性较差，居住质量差强人意。很显然，往往这样的廉价住房，对于有能力逐渐实现上升流动的高学历新移民而言，毕竟是一种临时性的住所。

3.1.2. 合租：对次级关系的依赖

在此，笔者将“合租”定义为租客自行将多余房间转租给他人并一同居住，或相识的多人共同租借一套房的行为。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正式的租住方式，合租的好处在于房客之间有互相选择的余地。合租的行为过程中，不仅房租被分摊了，房客之间在租赁行为确定之前就必须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刚毕业的时候，跟人家合租要看和什么要的人合租。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都本科毕业，都外地的，谈得来，兴趣爱好比较相投。这样比较合适，住得也比较开心。住老公房呢，可能觉得人员相对比较……因为你住进去才能了解别人嘛，当时也不想冒风险找合适的室友。当时收入也有一定积蓄了，也有这方面的支出了。找老公房就相对简单些，住得也舒适一些。因为合租的话，洗手间什么都方便，做饭什么的比较像家一样了。”（个案 16）

在调研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组非常特殊的个案（个案 3 曾经的住所）。虽然在一套三室二厅的住房内租住着 5、6 人（房客有过变动）。但这些房客基本由一群大学同学构成，其中有 3 人为大学同宿舍的室友，有 2 人工作于同一家公司。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并非在上海就读大学而就近结伴租房，而是所有人在上海找到工作后，相约一起租房。虽然居住环境相对拥挤，但日常生活的氛围非常融洽：

“挺热闹啊。跟大学宿舍一样啊。真的，跟大学宿舍没两样。主要是大家都是同学，都要找地方住，大家住一起不挺好的嘛。其实如果都是男生也没什么不方便。现在这样的话，只有两个卫生间，他们女朋友觉得不方便嘛。不过他们也没办

[14] 上海市《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2006 年 12 月颁布

[15] 在前去访问一名租住在市区某群租房内的访谈对象时，在其居住的小区内到处可以看到“依法取缔群租”的宣传横幅，但实际上在该小区内群租现在仍然普遍存在。

法。本来她是住外面，后来没工作了就过来一起住。”（个案 3）

租房本身是一种充满流动性的租住形式（尤其在当前上海缺乏公租房的背景之下更是如此）。为了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租房行为中获得一种确定性，和同学、同事合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稳妥的策略。

对这个案例的研究，引起了笔者对高等教育重构个体社会网络作用的关注。以往对一般移民居住问题的研究显示，移民在居住选择上倾向于依赖更初级的群体关系（亲属、同乡）^[16]，而高学历新移民群体却显示出与之相反的特征，更多依赖于次级关系与次级群体的网络。

“有些像高中同学基本上就没太多联系，基本上上大学以后，关系好的就是大学宿舍的几个。高中同学其实只要不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大学阶段，人生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那时候不在一个地方读书学习的话，两个人关系会疏远挺多的。其实大学时代才是一个人心智成熟比较快的阶段吧，那时候交到的朋友可能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个案 14）

高学历移民对次级关系网络的依赖，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等教育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授予过程，高校的继续社会化的作用还体现在高学历移民社会支持的重构。这也是高学历新移民与普通外来务工者在都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差别之一。另一方面，对次级关系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是大学时代人际关系的延续。虽然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新移民的住房条件并不尽如人意甚至非常差，但如果是与自己信任的同学合租，对居住的满意程度就会高很多。不能忽视的是，经历过大学生活的高学历新移民，都有过集体宿舍的居住经历，尤其对于新入职的毕业生而言，对租住房屋质量的期待往往会与毕业前的宿舍相比。这也解释了笔者调研中观察到的现象：5 名同学可以合租一小套公寓而其乐融融，而一个人独租一套房反而会认为居住质量不尽人意。

3.2 从“租”到“买”之间的计算

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买房，这是一个困扰很多学者的问题^[17]。本文作者也并不期望能在这么短的研究时间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而侧重在将“买房的需求”作为一个即成事实的研究背景，从中分析高学历新移民在空间中从“流动”走向“固定”的过程中个体的动机和策略。

[16] Min Zhou & Guoxuan Cai: Trapped in Neglected Corners of a Booming Metropolis: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zhou, John R. Logan.ed.(2008),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PP226-246.

[17]陈映芳：《“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observer/pop_commentary/2010/02/28/163689.shtml

3.2.1 租房的不确定性

表 3 上海住宅用房销售价格指数和租赁价格指数的对比(2000 年=100)

年份	销售价格指数	租赁价格指数
2001	102.1	107.4
2002	111.0	107.4
2003	134.7	108.7
2004	156.0	110.1
2005	170.4	113.7
2006	165.0	116.4
2007	170.6	123.9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2008 年)

虽然中国大都市商品住宅价格节节高升,但房屋租赁的价格攀升却远比房屋售价上涨速度缓慢得多(表 3)。但即便如此,租赁却未必能成为新移民在上海长期生存的居住选择。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前中国大都市中公共租赁或集体租赁房屋的缺失。一般性的租赁房源,往往是个人出于投资目的,或是闲置出租的房屋。房东—房客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虽然也有希望长期租住者选择和房东签署长期租赁(通常采取事先协商逐年提租的方式),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租房者将租赁行为视作一种具有灵活性的“流动”策略,租房的条件、位置可随工作灵活变动被认为是租房的一大便利。同时,房客和房东的关系也会影响房屋租赁的稳定性——此时房屋仍然是房东随时可以收回的财产。访谈中一位被访者就向我抱怨了某一次因为和房东关系不和而搬家的经历:

“刚开始我们是愣头青,主要是第一个房东人太好了,我们都把钥匙给他的……(略)……第二个房东要我们把钥匙给他,我们也屁颠屁颠给他了。结果他三天两头过来,还觉得有时候在这里弄一点,经常说我们地又不干净啊,又怎么样啊。然后有时候把我们电饭锅拿走了,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他说我来你们家看一下,打个电话过来,我们说“哦”。后来电话都不打了,我们一看电饭锅没了。这些还好,我们一起住的有个人的高中同学过来找工作,暂时在我们客厅里住几天嘛,……(略)……我们就搬了床垫到客厅给他住。那客厅放那么大一个床垫,看上去不是很爽嘛,他(房东)有钥匙经常来,第一次看到他住在那里,说来找工作的,那就(算了)。过几天又看到他,再问他住多久了,他傻乎乎地说个把月吧。那房东就打电话过来骂了,就认定我们把客厅转租给那个同学了。闹得非常不愉快。”(个案 3)

与许多国家城市的房屋租赁体系不同,中国城市的房屋租赁体系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的居住选择模式,被许多新移民视为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公共和集体租赁房这类稳定房源的稀缺,使得新移民为了在都市中“固定”下来,不得不慎重考虑购置产权房的可能性。

3.2.2 从租房到买房的需求逻辑

拥有一套本地住房的产权何以成为扎根上海的唯一途径?在购房问题上,其实新移民和本地居民面临着类似的困难。高居不下的房价困扰着每一个希望购房的城市居民。然而,新移民的购房行为,是其最终实现在上海扎根的重要一步。虽然说在任何城市,租房总是移

民最主要的住房选择 (Wu,2002; Michael et al, 1998), 但在中国的大都市中, 无法购房 (而不是无处租房) 却成为了年轻人在都市中去留的最大障碍之一。

“如果要左右我留在上海, 或者回重庆, 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是房价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实, 摆在面前。(个案 12)

毕竟如果我们要安定下来, 就要买房子呀。我当时觉得吧, 如果我们能买得起房子, 我们就买。但要是房价像现在 (2009 年) 这样高的话, 可能我们就不买了。” (个案 13)

虽然住房的刚性需求经常被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致, 但陈映芳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解释, 她认为住房的需求是借助城市户籍制度的刚性设置而产生的^[18]。然而, 前文已经分析过, 户籍虽然是一项重要的吸引“人才”的制度性资源, 但年轻的新移民对于户口和居住证抱有一种“有最好, 没有就算了”的心态。另外, 由于现今居住证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 购房落户的需求即使存在, 但用来解释房市的需求, 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一种对自有房产的诉求已经被建构成为一种在都市中定居的必然逻辑,

“几个月前跳槽到现在这公司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 也是一个外地来的, 就一普通员工, 打招呼的时候问我“上海买房了吗? ”。我从那个时候突然间意识到: 哎? 我是不是该开始考虑这房子问题了呢? 好像别人都把这个当应该的事儿一样。……可是, 就是我那点工资, 算了吧。(个案 7)

如果我不住这个我肯定租一套, 租一套 3000 吧, 这套房子。3000 我可以月供来。我去弄个首付, 我这 3000 块钱月供, 我到时候还能卖钱, 对不对, 上海这个房子不会跌的呀。你肯定不会亏。这个账大家都会去算。” (个案 12)

房屋产权成为新移民在都市中占据“合法”空间, 并获得一种“合法”的身份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而制度规定意义上的身份——户籍在此已退居次要位置。

另外, 在购房决策过程中, 家庭、婚姻的因素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如果近期没有结婚安家的计划, 租房, 仍然会是新移民主要的居住选择。

“我肯定是要先把终生大事定下来, 才能考虑买房, 因为我觉得凭一个人的能力买房还是比较难的。我家里也会说, 自己家人先出钱, 先买了, 然后还房贷。我其实不是很想这样做。其实你真的算下来, 你买下来再还房贷, 跟你直接租相差不是很大。而且买下来再还房贷好像也不太合算, 要还好多年, 压力也很大, 那还不如租呢。租的话想对灵活一些, 还可以住得近一些啊什么的。” (个案 16)

中国社会年轻人对家庭“理所应当”的依赖, 构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居住选择上最大的差异, “本地人”即使自己不买房, 也可以通过与父母合住 (不用付房租或支付象征性柴米油盐费) 的方式合理地解决自己在高房价高房租压力下的居住问题, 甚至本地年轻人如果在结婚前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住, 经常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请求而被父母拒绝。

另一方面, 家庭在购房选择中的决策作用, 还体现在整个家庭对个体购房的倾力支持。按照目前的房价, 即使通过贷款购房, 首付对于一般收入的白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积蓄来实现首付, 则可能需要借用家庭的经济力量。向父母借钱, 或者父母赞助购房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手段。即使购房的钱是以“借款”的名义给出的, 但最后仍然

[18] 陈映芳:《“蜗居”困境的原因何在?》, 见上脚注

可能成为一种赠与的行为。

“唉，怎么说呢，如果要在上海总要买房，但现在，说实在的家里……不管家里怎么样，如果要买房，是不可能问家里要钱的。所以这点上还是挺吃力的。……你想啊，本来家里就没啥钱，现在我爸妈年纪又大了，能剩多少钱啊，能养老就行了，都辛辛苦苦供我读书了。于情于理各方面，反正我是不跟我父母要钱了。我女朋友还好了，如果要买房两个人一起努力嘛。近期一两年不会考虑买房的啦。”（个案3）

“我虽然家里的条件不怎样，但至少前两年的话，假设我硕士毕业，去年房价也没涨那么快。我们重庆的房价5000以内。难以想象重庆的房价那么便宜。那我说我们家肯定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肯定把首付给弄上，我们在重庆也有了房子，但在上海就不要想啰。”（个案12）

尽管许多被访者认为在购房过程中“不希望使用父母的钱”，“父母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但同时也认同如果不借助父母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在上海购置房产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新移民不仅自身作为城市的“人才资源”被吸纳到上海产业发展的体系中来，甚至他们的家庭经济资源也被用来为都市的城市开发买单。

4 “去”和“留”之间的权衡

既然在大都市中的居住生活是如此的不稳定，那么那些无法在大都市中购房定居的新移民，是否就可以自由选择回到家乡、或者转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发现：对于高学历移民来说，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其实已经从各方面重塑了他们的各项社会属性，使得他们具备了适应大都市的生活的职业技能和生活习惯。

4.1 个体被重构的社会属性

高等教育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知识层面上教育与被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个体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我国的较有影响力的高校几乎都分布在各大主要城市中，在高校学习的经历，同时也伴随着个体在城市居住的经历。对于一些在大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完成高等教育的新移民而言，大都市对他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许多人经过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市居住体验，已经无法适应小城市的节奏和社会秩序。

“（回到家乡）感觉也就那样，而且你还认为上海不好是吧，回去你发现还没上海好。整体的节奏，还有你觉得喜欢的一些东西还没上海舒服。一个是环境啊，节奏太慢了，几乎还是行政命令式的。另一个其实那边整体的一个思路吧，并不是很规范。比如是医药那块不是很规范。当地的环境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个案5）

“我离开M公司的时候，回去住了半个月，感觉对郑州的熟悉度，还没对上海的高。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大学到现在，基本上踏入社会我都是在上海。在上海整个的包括文化啊，习俗啊，生活习惯啊，都比较熟悉，反而回到那里以后觉得不是很熟悉了。我觉得上海呢，是比较有活力的，就是热点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的。可能我是从公关公司做起的嘛，可能对这个比较敏感。”（个案16）

“我对我家乡有两种看法，有过渡期，和我生活经历有关。我们家那边呢……要么就是在公司里面干，要么就做生意，要么就一种中年妇女开店。所有人——“人言可畏”，在小地方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大人就是在背后（说）这家小孩怎样，哪家小孩怎样。坐店门口，路过谁都讲。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讨厌那种环境，而

且因为一些家庭环境的原因吧，不是因为家庭富裕不富裕。我父母关系有段时间不是特别好，被人非议。然后那个时候那种生活压力社会压力，我出来以后觉得很不开心，极度厌恶那个城市。……我那时候就觉得小镇上所有人都很虚伪。”（个案 9）

大都市的生活节奏，生活压力固然大于其他中小城市或是农村，但许多人认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必要安于现状过小日子。这样一些观点的表达，隐含着高学历移民对在大城市里未来职业发展空间的想象和期待。

“我觉得累会累一点，但是我这个人就捣腾嘛，在这边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我就不喜欢成都。我从来就说我宁愿回重庆也不回成都。因为重庆比成都节奏快了一个拍，上海可能比重庆又快了一到两个拍。我其实个人觉得第一我可能比较现在节奏快一点的。”（个案 12）

“节奏太慢，年轻的时候不认为是好事情，想多折腾折腾。”（个案 5）

“回家乡也不现实嘛。其实我是 05 年我去厦门转了一趟，但是那边感觉是一个生活的城市，不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刚出来的时候你会想着工作的，到后来你可能会想生活，刚出来年轻人嘛肯定要找一個比较有活力的一个城市，比较适合工作的城市。”（个案 14）

对于那些来自小城市、城镇、农村的高学历新移民而言，他们早就适应了大都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相反，对他们来说，家乡才是一个需要重新去适应的生活环境。

然而，生活节奏、生活环境，这些都可以重新去适应。高学历移民扎堆大都市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他们学历、文凭、技术所带来的职业机会密不可分的。而这些职业机会，是否与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呢？

4.2 大都市的职业机会

在试图探索新移民居住问题，解答“蜗居”和“蚁族”式难题的时候，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新移民期望在大都市中扎根？上文所说的个人通过教育实现的“上升流动”，最后会落到哪里？而制度所赋予这些新移民的“人才”身份，终究是加诸于整个高学历群体身上的制度性光环，而非个人所能获得的主体性身份。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学历带来的，不仅是从事白领职业的资质，同时，对许多人来说，也是进入大都市的一条有效途径。高学历新移民进入上海，可以通过直接考取并就读上海的大学，也可以通过毕业后来沪寻找相应的职业机会。对于前者，他们在求职之前，已经在上海生活了至少三年时间，对这座城市已经非常熟悉，自然而然优先选择了在上海的职业机会；而后者则被上海的职业机会所吸引而来，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实际上，你知道么，我如果重新报（高考志愿），我会往上海报，往浙江报，往南京报。因为你考大学的目的很简单。你走第一步，你上高中就不仅仅是上高中，肯定要考大学，你考大学的目的很简单，还是为了就业，所以上大学。那就，来一个，这边的经济最好，就业机会最多，待遇什么都是最好的。所以就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到这里来读书，就业什么都方便。”（个案 15）

“我比较喜欢强生（公司）。强生 500 强嘛，肯定上海 OK 嘛。重庆成都没有强生的，至少现在也没有强生的子公司。这就是一个缩影吧，在上海会有一些，至少是国内顶级的，可以达到你期望值的一些东西。”（个案 12）

然而，“上海的就业机会更好”并不能成为这些新移民留在上海的唯一动力。对于很

多人来说,虽然上海的职业机会是决定他们去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除此之外,无法在家乡或者是其他地方找到合适的工作却也是许多新移民面临的问题。

可以看到,许多被访者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上海生活压力的不满,包括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环境差的抱怨等等。从表面上看,在上海生活的高压时常迫使他们向往家乡轻松悠闲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也不忍子女在外漂泊受苦:

“大家的小孩都在外面。以前刚开始有大学生出去,留在外地工作,几千块钱挺稀奇。现在他们都觉得我们挺苦的。大家都知道了呀,你们这帮人在外面觉得挺光鲜亮丽的,其实都很辛苦的,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或者来上海看我,都是叫我回家,你回家考个公务员,比你在上海舒服多了。你一个小姑娘不求名不求利,回家考个公务员几千块钱,嫁个老公几千块钱,在我们那边生活的话很好了,干嘛要在这边遭罪啊,2000多的工资,租房子租掉1000多,吃个饭还没钱呢。”(个案9)

“在那边朝九晚五,什么朝九晚五啊,那就是朝十晚四啊,太舒服了。而且,你想想,不管是在城里,成都绵阳还是小县城里,中午可以回家啊,可以睡一觉,慢悠悠地走过去,哎,还可以在那边调整半个小时,大概3点开始上班,上到4点半,不好意思我们下班走了啊。下班以后打打牌,喝喝酒,吃喝嫖赌就那个样子的。”(个案7)

“说实在的,有可能回去过得还比较好。我妈老是经常说,让我回去好了,回去住的地方不用愁,吃还能吃,不能说吃香的喝辣的,起码能吃热饭碗。但回去也没什么事情做,也懒得回去。”(个案4)

大学毕业生在大都市中的生活已经不再像许多年前一样光鲜,这些高学历新移民也开始质疑自己留在大都市中的选择。一方面,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并非每个人都能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在都市中的工作回报也许并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人收入当然会有很大差异。然而,部分高学历移民从事的工作,需要承受工作时间长、强度高、收入少的压力。大都市中的白领从业者已经是一个在经济上差异化很大的群体。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高学历移民而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所要承受的,一方面是在大城市与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同学的对比下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和家乡较轻松自在生活对比的压力。

“父母也很担心你嘛。他们会不可想象:你这大学怎么念的呀,一个月1500,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的。不是简单的说1500能养活自己。哎?不错呀。不是的。你毕业了就不能和其他人比了,就要和你同样本科毕业的人(比),人家就说,哎呀哪家一个同学毕业,一出来就4000,一出来就3000,现在拿8000。这个压力……在家别人也会问我父母呀,哎你家孩子在哪里啊?在无锡,一个月1500。开玩笑的吧,我们又不朝你借钱,你干嘛说那么少。这个压力是无形的很大。个人对自己的期望也达不到。我觉得人为什么会痛苦,我觉得矛盾就会痛苦,期望和现实有差距的时候就会痛苦”(个案4)

“回去之后完全处于我觉得比计划经济还舒服。工资嘛拿到2、3000,房价也就3、4000的样子。你想我在上海这边买套房子2、3万了。买一个40平米50平米我都要100多万,我要回去买的话,100万我能买别墅了,你想想,我干嘛要留在那边啊。如果真的给我机会,我就回去了,这破公司……”(个案7)

但事实上,即使在上海生活压力再大,困扰着许多新移民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轻言“离开”。这样一种“无法离开大城市”的困境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对于一些从事技术类和某些高端服务性行业的人而言,类似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就业机会的城市，而根本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尤其对于一些小城市、县城、甚至农村出来的新移民而言，从就业和个人发展的角度考虑，他们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和在都市中积累的工作经验，一旦回到家乡便无用武之地，或者无法实现与在上海工作等同的价值。

“因为搞 IT 嘛，说穿了。在浙江这边招 IT，浙江有什么……除了杭州、宁波。宁波基本上除了个波导也就没什么大企业了，波导可能所谓的 IT 也就是做个手机嘛……在中国做 IT 的，只有上海、北京、深圳还好点。上海北京深圳房价都差不多，我在上海都那么多年了，何必去呢。我去其他地方工作还差不多啊。说实话在上海，没有钱的打工的就烦房子的问题啊。北京和深圳房价也差不多啊。说起杭州，房价也差不多，说起做 IT 工作的话，上海远远比杭州好找啊，还不如留在上海。”（个案 3）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 IT 之类的技术人员对大都市的职业机会情有独钟，许多从事新兴生产服务性行业的新移民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发展”。对他们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在家乡（哪怕是在当地的中小城市里）都未必能找到合适对口的职位。而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在上海、在这个行业里所积累的经验。简单的来说，对他们而言，家乡是一个缺少“机会”的地方。

“像我之前做猎头，肯定不能考虑回去，因为猎头这个行业来说，上海是在全国做的最好的，也是最专业的，包括北京和广州都没有上海做得好。而且猎头挺注重你的资源和积累的嘛，那那块也没有这样的市场，我找不到收入差不多，同样类型的工作的。现在做人事也一样，这边的收入跟那边的差异也是挺大的，你既然已经习惯了这边，你回去还得重头开始。”（个案 16）

“呃…这是个难题，你想回去呢，不一定回得去。你在当地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工作。你想我做房地产的吧，回去不一定能找到房地产的工作，更多的是建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如果我们那有像上海那么多机会，我肯定回去了，离家又近，对吧。”（个案 5）

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新移民真的愿意放弃自己积累的经验、人脉、技术，回到家乡工作，那么他们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无非就是公务员、垄断企业职工、教师之类的“铁饭碗”。而遗憾的是，对于很多家庭条件一般、在当地没有社会背景的人而言，从事这些“铁饭碗”职业又成为了一种奢望。

“别人都说嘛，像四川那边，都觉得，精英全走光了，剩下的全都是那种“垃圾”，家里比如是那种“太子”啊那种，利用关系留在那边的。真的属于那种，以前考大学 750 分的话，他给你考 150 分那样的人，公安系统里做的都是在学校里打架的，学校里黑社会的。……我要是有一个老爹或一个老舅，或有一个丈母娘在政府里面有关系的话，我马上就回去。”（个案 7）

“我有些同学回兰溪的，高中同学大概 50 个同学里有十来个吧。很多在金华的，在杭州的，主要这几个地方，跑到外边去的不多。一般都是在国企或者在公务员，比较稳定比较“铁饭碗”。我觉得这是有原因的知道么，就是如果我们这种家里没有背景的话，你回去，比如说考公务员，即便成绩考得好，你也不一定挤到那个位置上。还有进国企，你也是需要背景啊，走关系啊。回去的，大部分——不是说所有——大部分都是要么机缘巧合，要么是家里有背景，家里会帮忙打通关系，让他回去。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比在外边要轻松。但是像我们这种没钱没势，也没有关系，父母也不会去活动，没有能力也没这个钱的，那你回去也不一定……就是

即便想回去也很难挤得进去国企或者公务员队伍。像浙江在上海打工的,可能大部分家里条件都是一般的,如果家里有钱的说不定回去当小老板了。”(个案 11)

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社会上升流动的可能性,深刻地植根于大都市的城市秩序和社会规范之中。部分在家乡有稳固社会关系网络的高学历者,如不愿意在大都市中奋斗,随时可以回到家乡,通过家庭的社会资本来换取一份稳固的工作。而那些在老家无法继承有利社会资本的个体,最好的选择,仍然是留在城市中,以自身的文凭和技能来换取工作的机会。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大都市恰恰因其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成为了他们通过教育实现上升流动的最好平台。

在类似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中,高度发达的高新产业和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带来的是对服务型行业从业人员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大量需求(见表 4)^[19]。反过来说,拥有高学历的群体也需要依附于一个汇聚大量高新制造业、先进服务业的中心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政府所有针对“人才”的制度政策,无不为了满足都市特定经济部门的增长需要。然而,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在空间分布上一直较为分散,并不能如全球城市政策所愿汇集于个别大都市之中^[20]。都市政府开始动用其各项制度资源来换取“人才”向大都市中聚集,以加强大都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力(陈映芳, 2009; Logan & Fainstein, 2008; Doulet, 2008, Douglass, 2000)。

也正因此,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由于自己身上所背负的“技术”“工作经验”的包袱,不愿意回到家乡,或者去其他中小城市“发展”,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家乡不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地方。

表 4 上海市从业人员产业结构(单位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11.1	59.3	29.6
2000	10.8	44.3	44.9
2006	6.3	37.0	56.7
2007	5.9	37.7	56.4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2008 年)

5 结论与反思

柏兰芝在介绍卡斯特空间理论时说:“精英是世界主义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而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植根于地方”^[21]。高学历新移民正是靠着自己的文凭与知识技能换取较好的白领工作机会,积极参与到大都市日益全球化的产业经济之中去;而他们作为一个个在都市中生存的个体,却又需要终日面如何在都市空间立足的最

[19] 在解读表 4 数据时,需要注意此表仅能说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总体比重上升,而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内部的结构并不能从此处得知。

[20] Diana Farrell & Andrew Grant: China's Looming talent shortage, The emerging global labor market. 2005. <http://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emerginggloballabormarket/index.asp>

[21] 柏兰芝:《如何思考城市问题》,《国外城市规划》,2006 年第 21 卷第 5 期。

基本之问题。对于个体收入不能负担大都市房产、又得不到家庭资助的个人而言,这种割裂的矛盾会长期存在下去,伴随他/她在大都市中工作与生活。日益全球化的城市产业经济对这些新移民而言是两面的,一方面意味着多元的职业机会和丰富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必须消费却又难以消化的都市空间。大都市生活对这些高学历新移民而言,是一种“低社会成本,高经济成本”的生活选择。目前上海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中房价的高涨、公租房的缺失等因素一起将中下层白领移民排斥在稳定的都市生活之外,而小城市、乡镇依靠不透明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职业系统,也同时将这些新移民排斥在外。高等教育实现的社会流动,对许多新移民而言,是一种单向的,农村、小城镇向大都市的流动。这些新移民,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窗苦读,被塑造成了为大都市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然而,即使他们成功在大都市的产业系统中找到了他们的职业位置,以房价为首的高额生活成本却成了他们向稳定的都市生活流动过程中难以解决的矛盾。

高等教育,赋予了个体获得知识的机会,也赋予了这些个体在都市中“工作者”的身份,以及政策和制度的层面上的“人才”身份。“人才”身份并不属于个体,而是一个制度和政策的建构物。真正在都市中生活作息的,是作为“都市人”的个体,而不是作为“人才”的个体。然而,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一瞬间,作为“人”的身份慢慢被消解了。“大学生”、“天之骄子”、“人才”等非主体性的身份取而代之成为了高学历者的标签。正是因为“人才”和“人”两种身份之间的脱节,“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廉思所称的“蚁族”)才可能成为一个被关注的都市问题。能获得都市户籍、居住证、人才公寓的,首先不是作为个体的“人”,是能够为都市开发和经济建设带来经济推动力的高级劳动力资源——“人才”。作为活生生的“都市人”的高学历移民,却恰恰处在制度和政策的盲区中。

当租房不能为在都市中打拼的新移民提供稳定居住条件时,新移民希望寻求的,是通过购买房屋的产权来实现的对都市空间的占有。而户籍带来的制度性“新上海人”身份、职业带来的“白领”身份、学历带来的“人才”身份,都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人”。一个新移民,始终不能在都市空间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只能在茫茫都市中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只能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描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类似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笔者期待能看到更多的有深度、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深入解答我们的“蚁族”、“蜗居”之感。

附录:本研究所涉及的访谈对象

编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来源	学历	职业	在沪居住情况
1	方 Y	22	女	浙江海盐(农村)	本科	无业	群租
2	凌 W	26	男	广西百色	本科		合租
3	刘 HS	28	男	浙江龙泉(农村)	本科	IT 技术人员	合租
4	刘 L	24	男	四川(小镇)	本科		合租
5	刘 YG	31	男	山东(县城)	硕士	房地产业务员	独租
6	苏 W	30	男	四川(市区)	本科	公务员	购房
7	童 J	28	男	四川绵阳(小镇)	硕士	咨询公司研究员	群租
8	童 XC	28	男		本科	IT 技术人员	合租
9	王 P	24	女	江苏(县城)	本科	咨询公司业务员	合租

10	魏 QL	28	男	安徽	本科	IT 技术人员	合租
11	吴 XX	28	男	浙江金华(农村)	本科	IT 技术人员	合租
12	王 P	28	男	重庆(近郊)	硕士	医药	合租
13	颜 HF	25	女	江苏	本科	事业单位文员	购房
14	张 XY	28	男	福建(农村)	本科	IT 技术人员	合租
15	郑 K	29	男	安徽砀山(农村)	本科	业务员	群租
16	周 YG	26	女	河南郑州(市区)	本科	猎头/人事	合租

参考文献

- [1]曼纽尔·卡斯特.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千年终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2]伊夫·格拉夫梅耶尔. 城市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3]迈克·戴维斯.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4]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5]丝奇雅·沙森. 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 [6]陈映芳. 移民上海—52 人的口述实录[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 [7]陈映芳等. 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8]廉思.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9]王晨,张斌贤. 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0]柏兰芝. 如何思考城市问题[J].国外城市规划,2006,21(5).
- [11]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8(3).
- [12]陈映芳.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A].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53-680.
- [13]冯建军,李为忠. 教育发展的根本之道在于尊重教育规律——对十年扩招之路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09(2).
- [14]李斌. 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J]. 社会科学研究,2002(3).
- [15]廉思. 我国“校漂族”群体的生存现状与定量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9(4).
- [16]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 [17]牛海彬,白媛媛. 解析布迪厄教育再生产理论[J]. 外国教育研究,2006(5).
- [18]庞丽华,张志明. 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4).
- [19]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J].战略与管理,2004(1).
- [20]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 [21]吴维平,王汉生. 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2(3).
- [22]赵晔琴. “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J].社会学研究,2008(2).
- [23]张德祥.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J].社会科学辑刊,1997(3).
- [24]周作宇. 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5).
- [25]Brenner,N.& Kell, R. The Global Cit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Grancis Group [M]. 2006
- [26]John R. Logan.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M].Blackwell Publishing,2008.
- [27]Sassen, Saskia.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3rd e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 Pine Forge Press, 2006.
- [28]Aaditya Mattoo, Ileana Cristina Neagu, Caglar Ozden. Brain waste? Educated immigrants in the US labor marke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87).
- [29]A.M.Findlay, F.L.N.Li, A.J. Jowett, R. Skeldon.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A Study of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6(21).
- [30]Ann P. Bartel. Where Do the New U.S. Immigrants Live[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9,7(4).
- [31]Baiyin Yang, De Zhang and Mian Huang. Nation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4 6(3).
- [32]Kam Wing Chan, Li Zhang.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J].The China Quarterly, 1999(160) :818-855.
- [33]Michael H. Schill, Samantha Friendman, Emily Rosenbaum .The Housing Conditions of Im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J].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1998,9(2).
- [34]Weiping Wu. Migrant Housing in Urban China: Choices and Constraints[J].Urban Affairs Review, 2002,38(1).
- [35]Weiping Wu. Sources of migrant housing disadvantage in urban Chin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004, 36 :1285-1304.
- [36]Weiping Wu. Migrant Settlem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Metropolitan Shanghai[J].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1).

“Professionals” in metropolis space—The residential choice and job opportunity of highly educated new immigrants in Shanghai

Lu Weixu

(The Center for Chinese Modern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o put the young highly educated immigrants into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ity”, this paper show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ystems of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household and the upward social mobility of young people, and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buying a house” to achieve the social status for the educated immigrants.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e dilemma of the new immigrants as “professionals” in the city government’s “admit-exclude” housing institution.

Key words: highly educated immigrants, metropolis, residential choice, job opportunity